

归有光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归有光

【散文选集】

张家英 徐治娴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有光散文选集/(明)归有光著;张家英,徐治娴
编.—2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1784-2

I. 归... II. ①归... ②张... ③徐... III. 古典散
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8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208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3.8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归有光和他的散文

张家英 徐治娴

归有光，字熙甫，早年自号项脊生，后改号震川，学者称为震川先生，昆山（今属江苏省）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卒于明穆宗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享年六十六岁。

归氏为吴中一大族姓。其定居昆山的一支，无人在朝中任职。归有光的曾祖归凤，曾中成化十年（1474）举人，担任过兖州城武（今山东省成武县）知县。祖父和父亲都只是县学生员，未曾出仕。他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了。

归有光五、六岁时开始读书，九岁能文，十岁已能写出成篇的制艺文字《乞醯》（本文所举归有光文，凡见于《震川先生集》者，均不加注）。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二十岁补苏

州府学生员,名列第一。此后,曾在苏州府学读书数年,又曾与同学结为文社,读书论文于马鞍山(在昆山县西北)中。三十五岁中南京乡试,本应第一而列为第二(参见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震川先生集》附录)。从第二年起,他每三年一次,到北京去参加会试,结果是八上春官,均不第。

嘉靖二十年(1541),归有光三十六岁。他卜居于嘉定的安亭,此后即开始了二十多年的授徒生涯。由于他颇有名气,来跟他学习的多至数百人。这段期间,他除了授徒外,还有以下几件事值得一说。

一、创作大量散文。《震川先生集》中所收 605 篇散文,写作年代可考者在半数以上,其中作于此一时期的约 180 篇。另有一些写作年代虽不可确考,而写作时间可大致推定的作品,也大多作于此一时期。

二、撰写经史著述。据《明史·艺文一》载:其说经之作有《洪范传》、《考定武成》、《孝经叙录》各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另著录其《易经渊旨》一卷(《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这些都是为他授徒和应试所必需的。

《宋史》、《辽史》、《金史》皆成于元,或繁或缺,明人多欲为之重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三《宋辽金三史重修》条),归有光亦曾立下过这种宏愿(参见《与陆太常书》、《与赵子举书》、《与王子敬》等)。今《震川先生集》中尚存有《宋史论赞》一卷,即是遗留的痕迹(《明史·艺文二》另载归有光有《读史纂言》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未收)。

三、关心社会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归有光生活的太湖、吴淞江流域,水患颇多。明初虽

屡加疏浚,问题并未解决(《明史·河渠六》)。他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除写有《水利论》等论文外,另辑有《东吴水利录》四卷(《明史·艺文二》)。清代人认为:“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二》)

倭寇骚扰沿海,是嘉靖年间江浙地区面临的一大问题。为此,明代政府曾于吴淞江入海处增设金山卫,指挥官先是参将级,后升为副总兵级,并抽调附近各省区兵力,前来备倭(《明史·兵三》)。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入侵江浙地区,烧杀淫掠,为害惨剧。归有光潜心研究,除写有记事性散文外,还写有讨论备倭战略的论文,《论御倭书》即其中之一。

当年江浙地区赋役严重:“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明史·食货二》)归氏曾向有关当局进言,希望采取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在他给离职地方官和担任地方官的同年所写的赠送序中,多次提及此一问题,表现了他的特殊关切。此外,他为家乡弱女子张贞女被害一事奔走呼号,要求伸张正义,也是他关心社会问题的表现之一。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六十岁。这一年,他第九次到北京应试,中三甲进士。按照惯例,他先分到工部都水司试用,然后到吏部听候差遣。选授给他的官职是浙江长兴知县,官阶正七品。

隆庆四年(1570)春,归有光自邢州任上入贺京师,为太仆寺留修寺志。他的会试座主高拱与他所景仰的赵贞吉,当时都官内阁大学士,经他们推荐,归有光升任南京

太仆寺丞，官阶正六品。南京的官衔本为闲职，于是被留在北京内阁制敕房，先是草拟敕命，后专修《世宗实录》，这可算是他仕途顺利的短暂时期。不料浙江的监察御史仍要找他的岔子。得知这一消息，他悲愤交加。由于承受不了这种精神打击，遂于第二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郁郁不乐地离开了人世（参见王世贞：《归太仆赞》，《震川先生集》附录）。

二

从少年时代起，归有光接受的就是正統的儒家思想教育。后来授徒时，他要求学生读圣人之书，称述圣人之道，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见《山舍示学者》），灌输的仍是正統儒家思想。虽然他爱读《老》、《庄》，也曾尽见五千四十八卷《大藏经》，并于“《妙法莲华经》、《维摩诘》诸上品，皆略究其大旨”（《赠菩提寺坤上人序》），但从思想的主导方面考察，他仍是一个正統的儒生。这样，他的散文中不可能不掺杂着忠孝节义一类的封建伦理思想。但他的思想中也有若干闪光的因素。

他写过一篇短文《言解》。在这篇短文中，他把“终日而谈道”与“终日而谈鬼”相提并论，予以批判。虽然孔子指责过“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论语·卫灵公》）的行为，但在道学势力颇大的时代，敢于将“谈道”比为“谈鬼”，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他写过一篇《贞女论》。文章开头提出：

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

接着引来作为论据的，主要是《礼记·曾子问》中孔子与曾子的两段对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接着便说：

阴阳配偶，天地之大义也。天下未有生而无偶者。终身不适，是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也。

所谓“乖阴阳之气”、“伤天地之和”，跟今天说的违反人性的意思差不多。当然，儒家经典中也明确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但此所谓“人”，乃指男性尤其是男性统治阶层而言，是不把弱女子包括在内的。归有光提出女子于未婚夫死后可以嫁人的主张，是在为弱女子说话，是在为弱女子争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自不待言。

文章的末段还说：

或曰：“以励世，可也。”夫先王之礼不足以励世，必如是而后可以励世也乎！

这几句话表现了归有光对于维护封建礼教的断然拒绝的立场。他是有的放矢地采取这一立场的（《明史·列女传》三卷，内记守节、殉节的未嫁女子15人，另有举行“冲喜婚”后随即守节、殉节的女子2人。实际人数当不止于此）。

他又在《答唐虔伯书》中说：

天地正义，沦没几尽，仅仅见于妇女之间。吾辈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销铄：此等关系世道不浅。

今天看来，这几句话没有什么显眼之处。而在信奉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为真理的旧时代，要提出公然与孔子的观点相对立的主张，是并不那么简单容易的。这样看来，归有光也可算是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思想吧。

三

作为一位文学家，归有光的文学思想很值得加以探究。可惜的是，他没有留下一篇完整的理论文章，只有一些零碎的论述。

先看他对传统文学诗文的认识。

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古今人情无不同，而独于诗有异乎？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沈次谷先生诗序》）。

予谓文者道事实而已。其义可述，而言足以为教，是以君子志之（《孙君六十寿序》）。

认为诗出于情、文道事实，这反映的是儒家所谓诗言志、

文记事的传统观点,毋庸赘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率口而言”的“悯时忧世”的诗歌,应该为“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这表明:他对于民俗歌谣,是采取肯定与欣赏的态度的,跟一味排斥民俗歌谣的迂夫子颇不一样。

再看他对文质问题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孔子有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论述,一向是被视为经典的。他在《庄氏二子字说》中,也曾涉及到此一问题:

文太美则饰,太华则浮。浮饰相与,敝之极也。
……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
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质之所为生文者无尽也。

孔子强调“文质彬彬”,同时提出要防止“文胜质”与“质胜文”的情况的出现,原本是对如何才能成为君子而言的,后人则把它移用于对形式与内容(包括文学艺术)关系的解释。当然,孔子在别的场合,也曾一面宣扬“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的说教,一面赞同“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观点。这两者似不相容,后代文人谈及此一问题时,往往各执一端,为己所用(参见拙作《孔子文质观评议》,《东岳论丛》1986年第4期)。归有光强调“质可生文”。其观点可以说是源于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的。但当其接触到一些具体的文学技巧时,则又在沿着“辞达而已矣”的路线发展了:

尽有一篇好者,却排几句俗语在前,便触忤人。

如奸眉目又着些疮痛，可恶。

文字愈佳，愿益为之。此乘祥也，毋更令为外道所胜。幸甚幸甚。王司马云：“如上甑馒头，一时要发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辞欠妥耳。然可恶者，俗吏俗师俗题，见之令人不乐也（并见《与沈敬甫》）。

孔子只说了个“辞达”，归有光似乎有意要在“辞达”上作些文章。这篇文章要是认真地作下去，倒是有益的。可惜归有光依然说得模糊笼统，难以令人满意。

值得一说的，倒是归有光对当时活跃于文坛上的复古拟古派的态度。说到明代中叶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其根源应追溯至明初。明初文坛承宋、元之弊，其局面颇不乐观。对此，宋濂曾发表过如下议论：

呜呼！近代之文，予见之夥矣。大风扬沙，而五色为之昏昧；繁音嘈杂，而五声为之失伦。……此无他，无真实之功，求鹵莽之效。西抹东涂，莫寻统绪；左剽右窃，仅成简编。辄号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艰深文浅近者示之，则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畅达而无碍也！”是皆无真见，以人舌为之目，故硯然而无愧怍（《丹崖集序》，《宋文宪公全集》卷二）。

宋濂对上述文风的不满，代表了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于是，变革文风的问题摆到了文人的面前。变革的出路有二：一为创新，一为复古。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前、后

七子相继提出了复古拟古的主张。前七子的重要领袖李梦阳(1473—1530)“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后七子的领袖之一李攀龙(1514—1570)亦步亦趋,“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已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明史·文苑三·李攀龙传》)后七子的另一领袖王世贞(1526—1590)也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文苑三·王世贞传》)。并进一步论证说:

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前后七子文宗秦汉,诗尚盛唐;对东汉以后的文、盛唐以后的诗,采取一笔抹煞,一概骂倒的态度,这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当时,“七才子之名播天下,……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明史·文苑三·李攀龙传》),势头却也颇为吓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荒江老儒”,归有光站出来给后七子的领袖以猛烈抨击:

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

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

所谓“一二妄庸人”，指的即是后七子的首领李攀龙和王世贞。这种猛烈抨击，对复古派无异当头棒喝。对此一事件，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钱谦益（1582—1664），曾经作过如下的记载与评述：

当是时，王弇州（即王世贞）踵二李之后，主盟文坛，声华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举子，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树牙颊相揶揄不少下。尝为人文序，诋排俗学，以为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弇州闻之曰：“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熙甫曰：“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岁赞熙甫画像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识者谓先生之文至是始论定，而弇州之迟暮自悔，为不可及也（《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

钱谦益记下的王世贞对此的反应，应当是可信的。王世贞的反应正好证明：归有光所作的对复古派的抨击是正确的。此后，公安派继起抨击，终于使复古派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归有光为什么能独具慧眼，识别复古、拟古派的错误呢？这和他曾下大力气研究过古代散文的发展历史，总结过古代散文的创作经验，是大有关系的。

四

在明代文坛上，归有光是唐宋派的一员主将。他的散文创作，远承《史记》，近学韩、欧。他曾多次表示对《史记》的景仰之情：说自己“性独好《史记》”（《五岳山人前集序》）；说“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陶庵记》）；甚至曾得意地声称：

自以为得龙门（代指《史记》作者司马迁）家法，
可与知者道也（《与王子敬》）。

谈及文学创作的甘苦时，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经慨叹道：

文字难作。每一篇出，人辄异论，惟吾党二三子解意耳。世无韩、欧二公，当从何处言之。（《与沈敬甫》）！

他对韩愈、欧阳修的由衷敬佩之情，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

龙门家法与韩欧神理，是归有光学习和追求的两大目标。他特别重视学习龙门家法与韩欧神理，是通过总结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原本是源远流长。从宏观上看，在明代以前，散文创作有两个繁荣时期：一个是先秦、两汉时期，一个是唐宋时期，而后者又超过了前者。在先秦、两汉时期，孟

庄荀韩，作家辈出；而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当推《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史记》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司马迁花费毕生精力写成《史记》，不只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引）的愿望，也把他从前代和当代散文名家那里学来的创作技巧，全部熔铸于其中，而且作出了自己的光辉创造。正因为这样，他赢得了后人的巨大尊敬和崇高评价。唐朝的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时，原是主张广泛地学习先秦、两汉的优秀散文的。他通过比较注意到：“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答刘正夫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又注意到：“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柳宗元也作过这方面的比较：“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殷、周以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一）此外，韩愈与柳宗元，都曾将对方比作过司马迁。柳宗元生前，在对人谈及韩愈的文学成就时，毫不含糊地说：“迁与退之，固相上下。”（《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柳宗元死后，韩愈评价柳宗元的文学风格，使用的是“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新唐书·柳宗元传》亦引）一语。韩、柳的上述看法，对于归有光认识古代散文，显然是有积极影响的。后来，清初的方苞声明“《史记》为古文正宗”（《古文约选序例》，《望溪先生集·集外文》卷四），则把这种看法表达得更加明确了。

唐宋时期的散文家中，以八大家为最有名。而八大